



# 野老丹心 翁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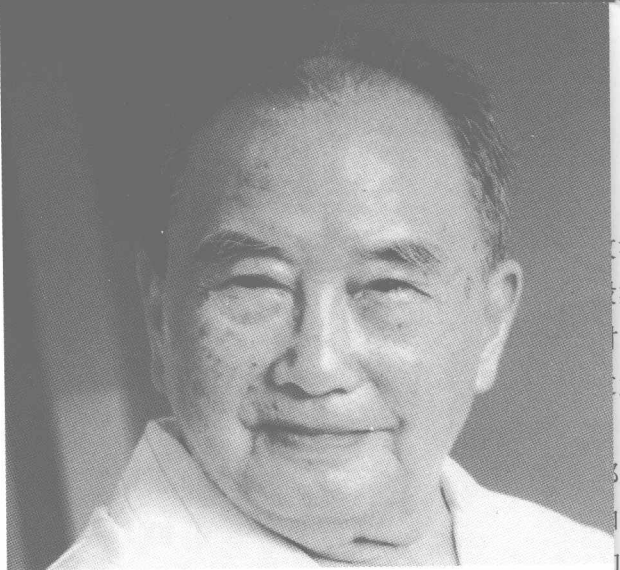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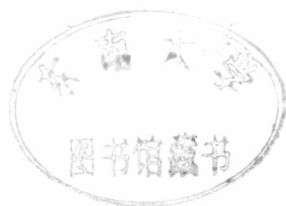
K825.1-53  
2



# 心丹老野翁 一放翁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SEU 06681780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 - 7 - 216 - 07156 - 7

I. 野...

II. 本...

III. 刘绪贻—纪念文集

IV. K82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863 号

野老丹心一放翁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1 449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4.25  
插页:18

版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156 - 7

印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 我和刘绪贻教授

(序一)

叶笃正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绪贻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和绪贻是清华同学，但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因为我们在两个学院，我在理学院，他在法学院。后来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学气象学，他学社会学。但我们住在一起，因而就逐渐熟悉了。

一个人到了异国他乡，和本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国家，想融入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熟悉新环境和新文化就需要花些时间。我们两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快就都熟悉并比较快地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两人都有很多很要好的美国朋友，当然也都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在众多朋友中，能够彼此知心无话不谈者，唯有我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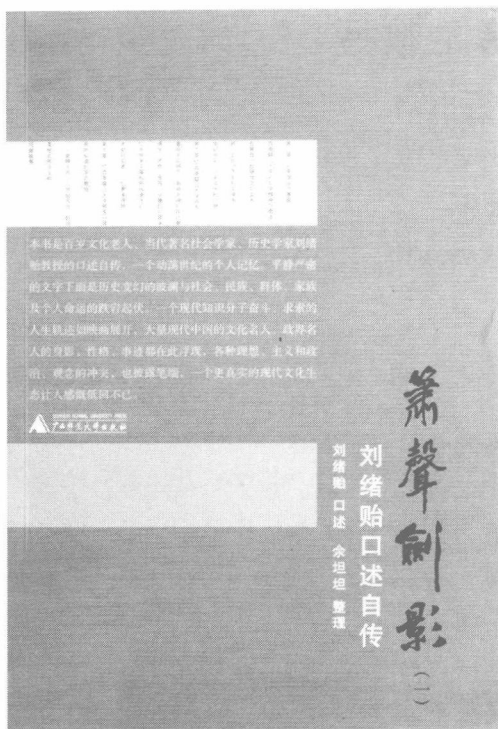


叶笃正院士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就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看到的多是美国社会繁荣和科技水平高，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学习它的自然科学，从而提高我国的生活水平。绪贻则不然，他用社会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之高是个果，它背后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华盛顿以及华盛顿之后的一些美国杰出总统和精英人物共同建立起来的。他的这种认识比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深入得多。我受他的影响，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进了一大步。

在美国我们两个都学得很好，都有条件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但我们两个都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是赤诚的爱国心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两个城市工作，还是常常互通消息。

绪贻回国之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授。20世纪60年代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

室之一（另一个在南开大学），讲授美国史，并带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国史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建人，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美国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6年，现在仍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他的一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六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并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请参阅爱思想网站刘绪贻专栏的《刘绪贻著译总目》）。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讲到这里，不能不问，绪贻做了这样多这样重要的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

作为一个老朋友，我祝绪贻健康长寿，多为人民再作贡献。

（本文系叶笃正院士为《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所作的序，由叶院士口述，周家斌整理）

# 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

(序二)

刘道玉

(武汉大学前校长、教授)

刘绪贻先生是武汉大学美国史和社会学著名的学术大家，他虽然已离休快三十年了，可是他一直笔耕不辍，晚年的学术成果累累，经常发出聋振发聩的声音，成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典范。先生的论著和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的赞誉，也鼓舞着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人。

先生出生于1913年5月13日，他比我年长20岁，是我的师辈。我们同是湖北人，他是黄陂县人，我是出生在湖北枣阳县。我虽然没有受业于先生，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永远的精神导师。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古人以汉语语辞的蕴意，或以汉字的笔画或是拆字法，来形象地寓意各个年龄段的寿庆，如



刘道玉教授与刘绪贻先生合影



喜寿（七十七）、米寿（八十八）、白寿（九十九）、期颐（一百）、茶寿（一百零八）等。按照传统的习俗，给老人祝寿是祝九不祝十，因此先生在校内外的学生和朋友们准备出版一本《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以此作为献给绪贻先生百年华诞的寿礼。该书编辑委员会来信约我写篇序言，我感到诚惶诚恐。但是，为了表达我对绪贻先生的崇敬之情，尽管我才疏学浅，但我还是不揣冒昧，以拙笔叙述我与先生交往的一些轶事。

我是1953年秋进入武汉大学学习的，当时绪贻先生已不在学校，但他解放前后在武大的轶事还是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先生1947年9月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旋即受聘到武汉大学任教。他思想进步，解放前被吸收入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任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并被选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武汉解放后，他被选为“协助（中共军代表）接管委员会”主席，协助军代表做了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学校，曾在武汉市（当时是直辖市）和湖北省担任过多种职务。但先生无意留恋官场，在追求学术真理的思想驱使下，于1964年重返武汉大学执教。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美史研究室，在美国史学界素有南刘（绪贻）北杨（生茂）之誉。

那时先生正值知天命之年，是学校比较活跃的教授之一。我于1963年由苏联辍学回国，与先生同住在武大珞珈山18栋。它们位于山南半麓，掩映在青松翠柏和香樟林中，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专为教授建造的别墅式的住宅。先生住在14号，我住在6号。我们上下班时常相遇，先生也偶尔询问我关于苏联国内形势的问题。

我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1981年7月出任校长之后，他是我利用暑假拜访和求教的六十多个教授之一。我主要是向他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情况，也询问他关于武大解放前后的历史，听取他对办好学校的有益建议。

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热情很高。当时历史学系是学校实行学分制试点单位之一，曾得到绪贻先生的大力支持。那时，大学生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组织。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历史系77级学生赵林是一个活跃分子，常常提出极有创意的问题。《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发表了署名“潘晓”致编辑部的信（作者是潘祎和黄晓菊二人的合名），标题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由此发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赵林去系资料室看书，他突然看到“潘晓”的那封信，他的思想就像触电一样激动，立即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编辑部根据他的观点，发表了署名赵林的公开信，题目是《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发表在该刊第8期上。文章刊出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

批评者说：赵林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是丑陋灵魂的大暴露。当时，正在开展清理所谓的“精神污染”，中央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指示把白桦的《苦恋》、王若水的《人性异化》和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作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一瞬间，赵林遭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在校内，我们却采取了“大事化小和小事化了”的低调处理方法，事实上保护了赵林。

赵林自幼喜欢哲学，1981年，他报考了我校哲学系的研究生，虽然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录取标准，但哲学系以他的政治表现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赵林就读的历史系伸出了援助之手，曹绍濂教授录取了他，但他对导师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经学校与刘绪贻先生沟通后，很快转到刘绪贻教授的名下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美国现代史。真是名师出高足，刘先生不仅保护了赵林，而且为赵林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二十多年后，赵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当年，若非刘绪贻先生慷慨同意接纳我到他的门下，我的学业就会半途而废。同样，1985年我毕业之时，若非刘校长的保护、热心关怀和亲自安排，我至今还不知流落在何方。二位刘姓前辈，一位是我授业之恩人，另一位是我知遇之恩人，大恩大德，难以为报，唯有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学术事业，以微薄的成绩还报恩师”。

在我出任校长之初，曾经把3—9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国际问题、数学、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病毒学等作为学校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国际问题方面，包括国际法、美加经济、世界史、西方哲学等，在这些学科方面，我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包括刘绪贻先生领导的美国史研究。他在美国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特别是研究罗斯福新政的权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观点。

《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是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后来由他的两位私淑弟子翻译成中文，于2006年出版。我十分想读到这本书，可是不知何处购买。2008年10月，我与夫人散步经过先生门前的小径，正巧遇先生由外面回家。故人相见，自是亲切无比，我们站着谈话15分钟，先生已是95岁高龄，但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这是人生之大幸。我们的谈话广泛地涉及改革开放，对“总设计师”提法的质疑，还谈到了当今国学热的问题。他说：纵观历史，凡是改革者都是批孔的，如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尊孔的。最后，先生说要送我一本书，于是我随他到家中得到了我一直想看的这本书。令我吃惊的是，绪贻先生写这本书时年仅34岁，对儒学透视得如此之深刻，实乃一家独到之言。

我怀着新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确受益匪浅。这部18万字的论文，是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的指导下写就的。由于见解独特新颖而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他也被列为芝加哥大学“杰出的中国校友”。



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诸如“中国儒学统治”、“儒学既得利益集团”、“儒化社会”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什么叫“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绪贻先生解释说：“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由‘皇家和儒生阶层’组成。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那只是换了皇室的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他进而分析道：“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儒化社会就是以儒家思想来治理的社会，统治者以儒家的思想维护其统治，而儒生又从统治者那里得到擢升和利益，是一个由独裁者与儒生相互勾结和利益均沾的社会。正如绪贻先生所云：“儒化社会的弊端在于必然形成帝王控制儒生，儒生治理百姓的自上而下专制独裁——一个社会只有皇帝与儒生极少数人成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既得利益如此单一而非多元化，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公平的，必然难于改革，必然危机四伏”。

学习了绪贻先生的论著，对于一个长久困惑我的问题，忽然茅塞顿开。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于进行，也正是由于当今的“儒学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是当今靠任命（而非民主选举）的最高领导者和新生的“儒士”也就是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古今对比，何其相似乃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护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可是，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吗？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趋炎附势的人，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批评强权的统治者。现在体制内的有权势的人，包括教育部官员和大学的领导人，他们虽然也拥有高级的学位和学术职称，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仅仅只是把“改革”、“创新”、“和谐”等口号挂在嘴边上，几乎没有一个在位的领导者敢于打破掣肘教育改革的禁区。试问：如果没有“敢于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怎么可能有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突破呢？

2011年4月25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北京《看历史》杂志准备约请10个文化人，各给清华大学写一封信。我问他们有哪些人，回答说有李泽厚、刘心武、周有光、易中天等。我又问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回答说体裁不限、观点不限、长短不限。鉴于观点不限，所以，我就接受了约稿，并信手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的信，题目是《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字数有五千多字。绪贻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又是清华老校友。于是，文成以后我第一个送先生审查，是否有不妥之处，请先生为我把关。

我的信文如下：

绪贻先生：早上好！

今年4月25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看历史》杂志邀请10个文化界的人士各给清华写一封信，我是其中之一，现把我写的信发给您审查，您是清华的老校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有不当，请赐教为盼。

学生刘道玉

2011年3月21日

绪贻先生看了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回了信，他写道：

道玉同志：

我仔细阅读了你给清华的信，真是金玉良言，苦口婆心。我敢断言，这样的信，恐怕只有你能写、敢写，其他九个人是不能、不敢写的。只有这样的信，才对清华有用，才是对症下药。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即使他们听得进，教育部也不会让他们听。作为清华校友，我感谢你。顺颂

时绥！

刘绪贻

2011年3月22日

得到了绪贻先生的首肯，我心里踏实多了，相信不会有太多的谬误。于是，我就把这封公开信发给了《看历史》杂志编辑部。《看历史》于4月初正式出版，遗憾的是编辑部删去了其中关于当今大学以及教育部没有反思精神原因的分析。这当然引起我的不快，遂向该刊声明保留以适当方式说明的权利。编辑部还算恪守信誉，他们随后在网上发表了我的公开信的未删减版。让我所料不及的是，这封公开信在各网站予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东方早报》等许多报刊也都予以转载，各大学的教师也以电子邮件相互传播这封信，一时成了人们谈话的主题。我感到很欣慰，毕竟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北京华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在网上评论道：“刘道玉的公开信，比清华百年庆祝大会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都要好，应当送到中央电视台播发，在全国展开讨论。”我在国外的不少学生，也纷纷发来邮件表示：“你的信真是太棒了！我们为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绪贻先生进入高龄后，我不敢轻易造访，唯恐打扰他的静思与写作。但每逢春节，我都会打电话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我特地去府上给先生拜年，并赠送了一盆盛开着的128朵鲜红的杜鹃花。那是一个精致蓝瓷花盆，由于盆体太大，我的小儿刘维东开车送到先生家的路边，再帮助搬到先生的家里。我喜欢杜鹃花，更喜爱古代和近代诗人以杜鹃吟咏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清

宋黄遵宪在《赠梁任父同年》诗中的后两句是：“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难道不是吗？当今我国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正是像杜鹃鸟啼血一样地在忧国忧民吗？不正是像精卫鸟不知疲倦地希望填平东海那样，在无穷地为改革而呐喊吗？宋朝诗人王令在《送春》中的两句诗是：“子规半夜欲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诗中的子规，也就是杜鹃。这是一种情结，是我国当今一批追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喊出的心声。无论时势如何艰险，他们都没有放弃，更不言退却。他们就像杜鹃一样，昼夜不停地啼鸣，直到啼出鲜血而死去，不正是为了唤回改革的春天，呼唤民主、自由、宪政和富强的现代文明中国吗？

刘绪贻先生的道德文章，正是体现了这种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我们晚辈后生应当以刘先生为榜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

2012年2月6日（元宵节）

于寒窠斋

# 志同道合的刘绪贻先生

(序三)

邓蜀生

(人民出版社编审)



邓蜀生先生

我是在1979年4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认识刘绪贻先生的。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刘先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杨生茂和丁则民等老先生也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那时在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编辑室，为开展工作，需要广泛接触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些学者，我于是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又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刚经历了“文革”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就像打开了窗户，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大家心情激动，情绪高昂。

刚见到刘先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聊起来很投缘。他原来是学社会学的，知识面比较广，我是记者出身，学问不深，但是涉及面很宽。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谈得拢，对当时的一些形势的看法也很接近。后来慢慢深入到学术观点，我发现他是一个研究有素的专家。

在参加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之前，我就深感国内美国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1955年的肃反运动过后的一两年，国内思想比较活跃。我在那时公开提到：中苏必有一战，中美两国将来必打交道。由于沙皇俄国侵占过中国的大片领土，苏联和中国之间其实有很深的矛盾。后来的事实不幸被我言中了，1969年就爆发了珍宝岛之战。但就美国而言，它在历史上没有侵占过中国的领土。我的这一判断也是基于自己的经历。我在教会学校上过学，抗日战争时期曾到过印缅战区，参加过抗美援朝，跟美国人打过交道，从自己对美国的感性认识出发，我觉得中美两国将来必然要打交道，应促进和加强对美国问题的研究。我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诤

言过这一观点。

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苏联史》(三卷本),但我们没有出版过相应的美国史著作,唯一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黄绍湘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但这本书的篇幅跟《苏联史》相比就相差很远了。黄先生的这本书从头到尾,从第一版到修订版再到第三版,都是我经手的。黄先生是中国研究美国史的前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我一方面很感佩黄绍湘先生的努力,觉得她能够以一己之力写一本美国通史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因当时的精力所限,她写的这本通史比较简要,对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这本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反映不错,但另一方面,我们编辑室也接到了一些读者来信,来信的人里面有老师、学生,还有一般读者。他们就该书的一些观点表达了一些不同看法,很多人都提到,这本书的观点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较深。这在那时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外交上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有些学者对这种研究现状不满足,希望能有更好的美国史著作出现。我于是想到,最好能出版一套新的美国通史,公正一点,摆脱苏联观点的影响。我当时还不清楚学术界的情况,我只是觉得中国人有智慧,不应该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对美国史作出独立的判断。

## 书 为 媒

在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召开之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议的全国史学规划座谈会于1978年夏天在天津召开,会议建议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这两个建议在次年都得到了落实。1978年4月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确定由杨生茂和刘绪贻先生领衔,组织国内学者集体编撰《美国通史》。这项工作与人民出版社拟出版《美国史》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推动此事,我代表人民出版社约稿,并自任责任编辑,鼓励大家早日着手,不用担心出版问题。

1979年11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议在武汉举行。研究会成立的过程比较顺利,同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支持,研究会就挂靠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当时武汉大学研究美国史的力量比较强,历史系的李世洞、李存训、王锦塘、李世雅、钟文范等老师都很热心,秘书处就设在武汉大学。

作为负责美国史、国际政治方面图书的一名普通编辑,我和刘先生通过学术交往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后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开年会,我往往跟刘先生住在一起,有一次从重庆坐船到武汉,我们又在一个船舱。他来北京或我去武汉时,我们也会找机会见面。应该说,我和刘先生从学术观点到私人交往都是比较融洽的,即便有歧义,我们也是彼此尊重。

## 执 着 坚 持

《美国通史》丛书从启动到出版，一共用了24年，由此也可以想见这套书问世的艰难。这套书的编写并不顺利。编写人员大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社会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写作，另外还存在经费或资料短缺的困难。1979年末美国史研究会成立期间，部分编写人员对完成《美国通史》缺乏信心，甚至开始打退堂鼓。以刘先生、杨生茂、丁则民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美国通史》可以完成，而且要高质量地完成。

刘先生的执着坚持对《美国通史》最终问世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代表人民出版社多次参加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议，我是支持刘先生的。考虑到各卷写作进度不一，我建议这套书先作为《美国通史丛书》出版，出书不用从第一册开始，成熟一本就出一本。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学养深厚的专家，有这么多新锐力量都在第一线，假以时日，这套书肯定可以完成。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学校已经开始启动科研项目，可以申请资助以弥补研究资金的不足，同时，项目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得到学校方面的认可。在许多场合，刘绪贻先生总是在给大伙鼓劲打气。由于有两卷的编写陷入停顿，刘先生和有关方面反复协商，想方设法，另请他人负责有关卷册的编写，使《美国通史》终成完璧。

刘先生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美国通史》六卷本得以问世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的坚持，《美国通史》六卷本就不会问世。《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被国内很多图书馆所收藏。这套书在印了两版之后，被收入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台湾也印了这套书的其中一部分。这套书对推动国内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 独 立 见 解

刘先生为推动美国史研究摆脱苏联影响、用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美国历史作出了很大努力。我历来主张，在美国史研究方面，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观点。中国人如何看待“新政”、罗斯福，如果完全跟着别人走，出版这样的书就价值不高，还不如直接翻译别人的东西。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看的角度、标准不一样，结论就会有所不同。比如苏联也不得不承认“新政”挽救了美国，但是“新政”为何可以挽救美国，大家的观点就大相径庭。如何看待“新政”的利弊得失是另外一个例子。刘先生与黄先生的学术争论，推动了中国对“新政”的学术研究。目前研究“新政”的中国学者，不管是从海外学成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新锐，几乎没有受苏联观点影响的了。

我觉得，像刘先生和我这一辈的学者和目前的一些学者不大一样。我们总强调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思想总体上还比较僵化，很多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坚冰难以破除，但刘先生和我都能比较客观中立地看待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持乐观态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现在从美国归来的学者，在美国的时间太长，受美国影响太深，中国文化的底蕴很不够，再加上又没有经历过历史上的跌宕，几乎都是在一种和平的口水战的环境中长大。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的观点与美国人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使用的材料也许很新，能挖掘出很多东西来，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跟美国人差不多，而缺少了自己的看法。

### 长者风范

我非常欣赏刘先生的长者风度，他为人非常诚恳，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很多老先生说话都留有余地，比较稳健，不得罪人。刘先生有时候不但对年轻人的批评很尖锐，而且有时候跟老一辈的学者争论得也非常激烈，争论起来面红耳赤。我很欣赏他开诚布公的态度。我们俩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很相像。

刘先生颇有长者之风，待人诚恳，与他交往不感觉拘束。在有的长辈面前，我们总担心自己失礼，怕把话说错，但刘先生很平易近人，他就不大讲究礼仪。这与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刘先生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的很多坎坷会给人观察社会以一定的影响。这也许是影响刘先生为人处事的一个因素。

我因为工作关系与刘先生有一些接触之后，对刘先生油然而生敬佩之心。他这么大年纪还在写东西，学电脑、用电脑，真不容易。刘先生百岁生日是件值得庆贺的大事，这么大年纪还在写东西的人还真不多。我也愿意在此特别向刘先生表达由衷的祝贺。



# 我心目中的刘绪贻先生

(序四)

张椿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刘绪贻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史学界的前辈。我和他是在制定中国世界史规划的过程中相识的。1978年，全国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这是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后史学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因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是我已记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是不会忘记的。一是在会议过程中，得知郭老（郭沫若）在京去世，与会学者十分悲痛，一些参加会议的郭老的故交纷纷离会，赶



张椿年研究员

回北京，与郭老作最后的告别。二是在讨论和贯彻座谈会的精神时，很多学者提出编写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美国史，希望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主持这件大事。我们世界历史所的领导朱庭光同志竭力支持这个建议。我那时在所内负责世界史的规划工作，为落实建议，不时要向刘先生请教一些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给以指导。在长期接触中，深感他为人真诚，工作严肃认真，我敬佩他的高尚品德。

刘先生是研究美国史的资深学者，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由研究美国史的学者来谈要比我更为深刻和全面。我这里只是说说刘先生在几个方面的学术功绩。

## 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刘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议于1979年底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选举黄绍湘先生为理事长，刘先生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由刘先生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所以，在1979—1990年，美国史研究

会的秘书处一直设在武汉大学。

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在缺乏经费又无专门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工作做得很出色，如定期召开年会、出版《美国史研究通讯》、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尤其重要的是，组织全国美国史专家撰写《美国通史》。美国史研究会为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国美国史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我们接到指示，要对研究会进行整顿，在整顿中，必须裁减一部分研究会。我们认为挂靠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会对本学科的建设都作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尽最大能力和有关部门沟通，想方设法把所有的研究会保存下来，虽然那时我们也听到对美国史研究会等一些研究会的工作有点议论，但我和所分管研究会工作的陈启能等同志坚定地认为这些研究会大方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应该继续存在。我们没有受一些意见的影响。张友伦同志接任美国史研究会的会长后，研究会的工作同样很出色，说明美国史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团体。

刘先生为美国史研究会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

### 主持《美国通史》的撰写，培养新一代美国史学者

上面已提到，由刘先生和杨先生主持撰写的《美国通史》，是在落实1978年天津史学规划座谈会的精神时提出来的，是世界史“六五”社科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内的精品力作。

以刘、杨二位先生为首的学者们为这部著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为出色地出版这部书，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也做了很多工作。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曾遇到种种困难，如有的学者承担了写作任务，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一拖再拖，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先生对此很焦虑，他曾给我写信，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这件事，我记得邓蜀生先也找过我。诸如此类的问题，肯定不少。为克服这些困难，要耗费刘先生多少精力啊！

现在《美国通史》已成为研习美国历史者和美国问题者必读之书，同时，这部书还培养了一代美国史研究的学者。

### 学 术 创 新

刘先生撰写了很多有关美国史论著。先生的贡献在于他在学术上的创新，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他提出的某些学术观点使人眼睛一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改革阔步前进，但在学术方面，因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略显沉闷。要想推动美国史研究的前进，就需要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刘先生开展对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了